

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。

还有人问,如何才能在借鉴之后有我们自己的创新呢?借鉴毕竟是手段,创新才是目的。近一二百年来西方语言学的视野的确比我们开阔,他们关心的语言数量和种类比我们多得多,但是也不可否认,他们的理论还多多少少带有一些“印欧语中心”的偏向。这虽然是不可完全避免的,但是我们在借鉴的时候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,批判的眼光是不可缺少的。理论总要受事实的检验,我们所熟悉的语言(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)在语言类型上有跟印欧语很不一样的特点。总之,学习人家的理论和方法,既要学进去,还要跳得出,这样才会有自己的创新。

希望广大读者能从这套译丛中得到收益。

沈家煊

2012年6月

译 序

对所有学语言学的人来说,如何把语言研究得最好是大家都关切的核心问题。要怎么研究语言,才能一代一代聚沙成塔地把知识的金字塔越堆越高?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,是在好几年前,当时有个朋友比较了数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行为。他说,数学家是站在同行的肩膀上,所以可以看得更高更远;可是语言学家却喜欢把别的语言学家踩在脚下!他对我们这一行人的评论或许过于苛刻,却一针见血地指出,语言学家常常爱摆空架子,把哗众取宠的新理论奠基在薄弱的证据上,于是才短短几个月,一出了新理论就把旧的给推翻掉。

我们现在都把“知识的金字塔”这个比喻,归功于20世纪的哲学大师胡适之先生,他说过:“为学要如金字塔,要能广大、要能高。”其实这句话更早前就有人用过了,至少宋朝朱熹的作品中就找得到。当然引用这句话的意思,并不意味着我们都该自顾自地盖自己的金字塔,发表那些哗众取宠的理论。这句话暗示,我们努力堆砌自己的小砖头时,心里都应该有一致的愿景,知道自己这一小块砖是不是符合整个大格局,并希望别人将来也能以此为基础再把自己的成就累积上去。我自己就常以另一句更平凡的口号自勉:大处着眼,小处着手。

研究语言演化正是这种有价值的愿景,因此穆夫温(Salikoko

S. Mufwene)教授的这本书,对知识的金字塔贡献良多。演化理论是一座更高大的金字塔,对于解释我们生物界起着莫大的作用。早在 150 年前,演化理论的鼻祖达尔文就看出,人类演化和语言演化其实非常相似。他在 1859 年的《物种起源》一书里写道:

“如果我们拥有人类完整的族谱,根据不同人种所绘制的宗谱图,就能帮助我们划分目前世界上众多的语言……”

达尔文 1871 年出版的《人类的由来》(*Descent of Man*),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生物演化和语言演化所作的比较。演化理论认为,改变源于三个因素间的交互作用:一是变异,二是选择,三是复制再生。随着特定因素的作用,结果当然也会不同,但是很清楚的一点是,不管语言演化或生物突变,都同样涉及了这三个因素。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,我才了解语言之所以改变,也是经由人在不同的变体间作选择,这些变体可能是在词汇、发音或意义上相互竞争,也可能是在更高层次的句型结构上。^①核心的问题就在于,我们应当设法追溯那些成功的变体,看它们如何在语言内部不同的扩散阶段被保留而沿用下来。沈钟伟教授研究上海话里的音变,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范例。^②

印欧学家施莱谢尔(August Schleicher)^③是第一位把演化理

^① Wang, W. S-Y. 1969.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. *Language* 45. 9-25.

^② Shen, Zhongwei. 1997. Exploring the dynamic aspect of sound change. 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* series 11.

^③ Schleicher, August. 1863. *Die Darwinische Theorie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*. Weimar.

论运用在语言学的学者,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才出版没多久,他的邻居,生物学家海克尔(Ernst Haeckel)就把那本书当作礼物送给了他。可是 19 世纪的语言学家,把语言比作有机生物,这种比喻未免失当。正如穆夫温教授指出,语言比较像拉马克物种(Lamarckian species),可以把创新传递给下面几代,不管这些创新如何习得且何时习得,而且一代一代间的传递可以双向进行。但达尔文的演化论却排除了这些可能性。其次,语言就像寄生在宿主身上的物种,它的宿主自然是说话的人了。即使语言的结构再完美,要是没有使用它的人,这个语言仍会绝种。语言演化和生物演化的这些基本差异相当重要,穆夫温教授在书中曾多次详尽探讨这些区别。

我认为穆夫温教授这本书,还有他先前出版过的丰富著作,主要的贡献在于强调接触在语言演化中扮演的关键角色。19 世纪的施莱谢尔所提出的语言演化概念,尤其是用树形图代表种系的方法,直到今日还影响深远。但这种看法过度强调了纵向传递的重要,而把横向传递边缘化了,因此扭曲了原本的演化观点。我前面引述过达尔文的那段话,也同样有扭曲事实的弊病,因此很快地就被达尔文的同行兼他的热衷支持者赫胥黎(Thomas Huxley)所驳斥。

卡瓦利斯福札(Cavalli-Sforza)教授和我曾经阐述过,横向传递可以是词汇发展的基础。^④我们最近作过另一项研究^⑤,试图以

^④ Cavalli-Sforza, L. L. & W. S-Y. Wang. 1986. Spatial distance and lexical replacement. *Language* 62. 38-55.

^⑤ Wang, W. S-Y. & J. W. Minett. 2005.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transmission in language evolution. *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* 103. 2. 121-46.

量化的方法,把纵向及横向这两种语言传递模式结合起来。语言变化里的横向传递,现在才开始慢慢走出树形图的阴影,因此还须借助更多新资料和新方法予以深入研究。阿错教授的博士论文^⑥,研究藏、汉语的接触及混合,提供了很多新资料,使我们对横向传递有更深入的了解。

穆夫温教授在语言演化中,整合了纵向与横向传递两种方式,这么做完全是有实证基础的,他把对语言的细致观察,牢牢地嵌入了历史与社会脉络中,所以他的书名里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字眼:生态。他举出了丰富的语言接触实例作为材料,其中许多语料是因为近几个世纪来随着殖民扩张才产生。他本身就是研究混合语言皮钦语及克里奥尔语的大师,而且他的研究范围遍及世界,跨足非洲、欧洲、美洲三大洲,以便寻找各类语言接触的根源。他的结论让人印象深刻,而且说服力十足,是帮助我们建构语言演化金字塔的不可或缺的砖头。

穆夫温教授研究语言,本着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辛勤耕耘的严谨态度,值得我们学习。虽然我现在是为他 2001 年出版的书写序,但是他已经又接着出了一本 2008 年的书^⑦,书的副标题就用了接触、竞争和变化几个字。本书的几位译者郭嘉、胡蓉、阿错教授特别值得嘉许,他们以精湛的译笔接受了这项困难的挑战。书中不少专有名词和观念来自不同的学科,对于学习语言学的人不免有些陌生。但是他们借着翻译引介这部作品,为我们中国语言

^⑥ 意西薇萨·阿错. 2003. 藏、汉语言在“倒话”中的混合及语言深度接触研究, 南开大学博士论文。

^⑦ Mufwene, Salikoko S. 2008. *Language Evolution, Contact, Competition and Change*. New York: Continuum.

学拓宽了跨学科的新视野。有了这些人筚路蓝缕的艰辛为我们打下基础,相信未来演化语言学方面的译书,能够进展得更平稳顺畅。

王士元

2009 年 3 月,香港中文大学